

A stylized world map in light blue on a dark blue background. The map is centered on the Atlantic Ocean, showing the Americas, Europe, and Africa. Overlaid on the map is the large, white, outlined text "CIA".

CIA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

〔美〕哈里·罗西兹克著

奋 然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

〔美〕哈里·罗西兹克著

奋 然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

[美] 哈里·罗西兹克著

奇 然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95 千字

1979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67·74 定价: 1.15 元

印数: 165001—240000 册

原 版 说 明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央情报局的一项首要使命是进行秘密活动，以对付苏联日益增长的力量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这是第一本向读者介绍在冷战与缓和的年代里，中央情报局如何侦查并反击苏联意图的书。本书既非揭露，亦非粉饰，而是一位曾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机构中干了二十五年的高级官员所作的坦率的评价。作者为美国的秘密活动轶事增添了新颖而又切实的内幕情况，其中有：

中央情报局如何向苏联纵深空投特务，以对所担忧的苏联军事进攻发出早期警报；

中央情报局如何支持波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的反共抵抗小组；

中央情报局打入克里姆林宫的三大办法；

共产党高级官员如何愿为美国效劳；

中央情报局如何反击苏联利用“色情间谍”来招募美国驻外使馆女性工作人员；

中央情报局如何想方设法打进一个恐怖小组的行动核心。

然而，这不仅是一本描写间谍和反间谍的书，作者还叙述了中央情报局如何成为白宫的“第三只臂膀”，后来又怎样先后被六位总统秘密地用来执行其外交政策。

本书还探讨了从古巴到安哥拉隐蔽活动的失败及其根由，分析了近来对情报机关进行公开调查这种作法的利弊。

最后一章是对秘密活动前途的探索，回顾了二十多年来美国旨在阻止苏联力量和影响扩大的遏制政策之破产。作者要求美

国采取积极战略以达目标，而不可跟在苏联和共产党后面转。他还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从道义或实效看，政治性暗杀是否无可非议？是否应该秘密干涉他国事务？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秘密活动的地位究竟如何？在今后的多年中，本书肯定会引起人们就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情报机构的职能问题进行政治性辩论。在你争我夺的世界上，美国前途未卜，对每个关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目 录

第一章	热战与冷战·····	1
第二章	从空中进入俄国·····	16
第三章	中圈·····	35
第四章	手持签证进入俄国·····	48
第五章	招募俄国人·····	59
第六章	外圈·····	75
第七章	全球性间谍活动·····	89
第八章	反间谍·····	106
第九章	隐蔽行动——宣传·····	132
第十章	准军事性隐蔽活动·····	148
第十一章	政治性隐蔽活动·····	166
第十二章	中央情报局的国内活动·····	187
第十三章	中央情报局陷入困境·····	204
第十四章	秘密活动的未来·····	229
译者注释	·····	248

第一章

热战与冷战

一九四八年春天，白宫认为美苏之战已经迫在眉睫了。

自从一九四五年雅尔塔会议以来，苏美关系日趋紧张。甚至早在对希特勒的战争结束之前，苏联就已着手采取行动，将参加同盟和协约双方的东欧国家拉入自己的集团。这些国家，尤其是波兰，接二连三被野蛮地俄国化，进而又共产主义化了。到一九四七年底迄止，除捷克这一个国家外，已全部沦于受苏控制的一党政府统治之下。在捷克，一个独立的，然而却是战战兢兢的民主政府劫后余生，与捷克共产党联合施政。

西欧一片混乱，似乎正在酝酿一场革命。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九四六年的罢工浪潮；意共似欲通过选举夺取政权；一九四七年五月，希腊爆发了大规模共产党暴动；莫斯科对土耳其施加压力，逼其“退还”卡尔斯省和阿尔达汉省，并对伊朗的阿塞拜疆提出了领土要求。

华盛顿的不安有增无已。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的一次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咨文。这篇咨文标志着对苏联的挑战已从提出抗议的阶段转向采取行动的阶段。总统在其冗长的综合性咨文中，要求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在希腊，是为了对付共产党游击队；在土耳其，则是帮助反击莫斯科的领土要求。咨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各国人民反对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外界压力的征服企图。”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杜鲁门主义。无论是对美国国内的共产党颠覆活动还是对苏联力量的运用，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了遏制政策。

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是对苏联压力的直接回答；数月后通过的马歇尔计划则是间接回答。根据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物质、馈赠和贷款，是为了稳定被削弱的欧洲国家，使其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该计划为西欧各国所接受。但对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援助却为斯大林所拒绝。欧洲遭到分裂，斯大林如愿以偿。正当美国迅速成为西欧政治和经济主宰力量的时候，斯大林却在加速巩固东欧。六月，匈牙利被共产党所控制。在柏林和维也纳，苏美双方相互对峙。

接踵而来的是战争恐怖。这主要起因于两大事件。

一九四八年二月，苏联煽起一场内部政变，使捷克共产党接管了政府，淹灭了东欧最后一个独立国家。布拉格的政变使华盛顿颇为震惊。美国轰炸机被派往英国机场。在被占领的德国，军事准备工作在加速进行。

同年三月初，卢修斯·克莱将军从柏林发出警报说，苏军司令部的姿态发生了他也说不清楚的“微妙变化”。他警告说，战争可能“戏剧性地骤然爆发”。克莱将军的电报使华盛顿的政策和情报部门对战争即将来临的胁迫感几乎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建立才六个月的中央情报局预言，六天之内尚不至于发生战争，但再往后就不敢说了。

克莱将军之所以会觉得苏方姿态起了微妙变化，是由于苏联准备将盟军赶出柏林。而柏林则是地处苏属欧洲心脏地区的西方孤岛。五月，苏联开始封锁盟军占领的西柏林与德国西部地区的交通和给养运输。杜鲁门总统拒绝了用美国地面部队冲破封锁的建议。他授权对柏林实行空运。美国运输飞机使西柏林居民整个秋天和冬天免遭饥饿；而数十名盟国飞行员却丢掉了性命，但他们的决心终于迫使俄国人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取消了封锁。

柏林封锁引起了冷战时期的首次正面军事冲突。“冷战”这一字眼从此便广泛用开了。

苏联对欧洲发动武装进攻是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一九四七年末，情况已经十分清楚，驻德、波苏军总数已大大超过了占领这两个国家的需要。捷克政变加强了苏联对其入侵走廊的另一地段的控制。三月危机促使五角大楼对苏方部队的作战能力作了一番现实的估计：从纯军事观点说，他们可以一直打到英吉利海峡。柏林封锁加深了白宫的这一印象。

白宫与五角大楼所要打听的是，驻东、北欧苏军的精确作战能力和真实意图。由于西方用正常手段已根本不能观察到目标地区的情况，因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派进特务了。一九四八年春夏之间，交给中央情报局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派遣间谍。这是在战争条件下执行的一项和平时期的使命。

对情报的要求主要通过口述传达给情报人员。我还记得在雾谷的一间拥挤不堪的会议室举行的情况介绍会。那些草草建成的“节奏室”是一次大战期间的临时性建筑物，也是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一部分。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位上校所作的情况介绍，精确、认真而又紧迫。他利用充足的地图、透明图、标志物，勾画出一幅苏军师团穿过北方平原对西欧实行钳形攻势的逼真的行动计划。他列举了驻在东德和波兰即将采取行动的师团的番号，用箭头标出其进军路线，指出位于巴赫米亚西部，将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捷克机场。最后，他强烈要求在上述三方面派遣谍报人员。

这一要求对于这么寥寥几个人来说未免来得有些突然。因为他们都是初干此种深奥莫测的情报工作。

我和到会的大部分同事一样，只是两年前才来到战后情报机关工作的。我们大都曾在战时“战略情报局”工作。局长是“野人比尔”杜诺万。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附近的河滨溜冰场向战略情报局男女工作人员告别，宣布了“一项不寻常的试验结束”。他说：“这一试验是为了弄清楚，一支由不同种族，不同能力，

不同性格，不同才干的美国人组成的队伍，是否能冒险与久经考验、训练有素的敌人相抗衡。”

这支混合队伍中的一小部分参加了这次“速度室”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他们的出身和性格不尽相同。出身高贵的白种人一道相与共事，他们中有第一代少数民族，偶而也有加入美籍的俄国人、捷克人或德国人。新政自由派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子孙们和政治上简单的中间派朝夕相处。他们当中，有一些是高中毕业生，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还有学位；有的曾与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一道在敌后干过；还有的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国军队发动进攻以后，被空降到法国，或当盟军进入德国以后，负责向敌后派遣谍报人员，在波恩和斯德哥尔摩处理情报，或与英国人一起进行对德反间谍活动，编写并广播反纳粹宣传文章。他们除英语外，几乎都能说一种，甚至两种外语。

其中和我最熟的，有两位战前记者。还有：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州骑警，几位传教士的儿子，一位阿拉伯后裔律师，一位前邮政局职员以及几位大、中学教员。

妇女当中有许多人到过欧洲。她们在战争期间一直做办公室工作，如报告起草员，反情报分析人员及各种活动的辅助人员。

我们绝大多数都很年青。有些三十刚刚出头就在华盛顿当上了地区科的首任科长，或驻外情报站首任站长。我们大都在二十多岁就成了首批办案人员，负责在国外招募特务的工作。在和平时期的情报活动方面，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

我记得，一九四七年初的一天，我和一名同事到一家咖啡馆吃午饭。我们进门后，他就朝门旁一站，看着眼前这一付景象。屋子里几乎有上百人，高矮肥瘦，肤色深浅不完全相同。有的衣冠楚楚，有的邋邋遑遑。有带地方口音的，有带外国口音的，真是南腔北调，混杂一堂。

这位同事于是说：“你瞧，谁会想到是什么风把这些人吹到一起来的？”

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在战后继续留任公职，是因为受到某种秘密职务的感召或是因为对异国生活的向往。当然有人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就是那些除了在战略情报局工作就别无其他阅历的人，那些一回老家就只能找到粗鄙工作的人们。还有些人之所以留下来，与其说是受战时经历的驱使，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国外动荡的形势颇为了解。很多人的的确确是出于一种继续为祖国效劳的愿望。

谁也不是为了找个安稳的职位才来的。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一个未经国会授权的临时机构的临时雇员。一九四五年九月战略情报局解散以后，其秘密情报和反情报分局就隶属于陆军部长，称为“战略勤务小队”。而后，这个“战略勤务小队”于一九四六年春又转属另一临时性的代理机构而改称“中央情报组”。我们预感到终将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美国情报机构，但在当时，的确连个影子也没有。

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危机之前，我们一直处于一种悠然自得的，无人问津的状况。在国务院、陆军部或白宫，甚至连知道有这么个“战略勤务小队”或“中央情报组”存在的人也是寥寥无几的。我们没有合法权力，无人给予指导，谁也没有要求过我们提供情报。国务院不大愿意把驻外机构的职位或头衔让给不懂外交的陌生人。而大部分情报人员住的都是驻德、奥、意、日等国军队的房子。联邦调查局对我们的态度如非敌视，则是蔑视。

奇怪的是，我们虽然默默无闻，却是整天忙碌。什么清理战略情报局的旧日记录啦，什么建立档案，规定制度啦，什么处理从战场归来的人员啦，印发搜集到的微不足道的情报消息啦，与原始中央记录核对名单、复制截获的德国和日本文件啦，编写训

练计划和进度报告，填写谍报人员情况调查表啦等等。

在那忙乱、庸碌的岁月里，我的精力集中在苏联和共产党问题上。这是我参加谍报工作的兴趣之所在。不到六个月，我的名字、职务、背景，就进了莫斯科的档案。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汇报工作时，一个年青人认真诚挚地向我介绍了安全问题的情况。他责成我不要把我的工作地点和性质告诉任何人，连老婆也不能说。

四月份我给上级机关打了一份例行报告，要求他们设法订几份苏联共产党的期刊。九月的一天，我在信箱里发现一本用棕色包装纸包着的、盖有莫斯科邮戳的杂志，上面写道：

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

E大街二千四百三十号

战勤队特计——苏联处

哈里·罗西兹克处长 收

很显然，订杂志的人并未受到安全人员的指点，不知道为秘密部门的地址进行掩护的秘诀。

战勤队代表战略勤务小队，也是我们当时的通讯落款。特计——苏联处代表特别计划——苏联处。该处是当我从德国回来发现总部没有专人负责苏联问题时，特意为我设立的。我们的主要业务单位是各地区处，如：远东处和欧洲处等。当时在这个行当里，尚未设立苏联处。

在编制上，该处下属三个科，即苏联情报科、“国际共运”科和苏联科。前两科各有一男一女，第三科尚属无人。所有会讲俄语的人都已派往国外。然而，就是这个苏联科后来竟成了苏联业务处的核心。该处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苏联境内安置情报特务。

在我任职的头六个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为我手下的三个科罗织合适人员以及阅读材料。我将战时记录统统作了仔细清理，搜寻其中一切有关苏联和苏联情报机关以及各合法或地下共产党

的正常职能的资料。

大部分截获的有关苏联、德国和日本的文件都没有多大情报价值，都是些枯燥、过时的玩艺儿。但是，其中有两篇关于苏联间谍案的反情报文章，我倒认为是令人着迷而颇有教益的。一篇是日本人写的，关于理查德·佐尔格经历的文章。理查德·佐尔格是个才华横溢的德国记者，后来成了德国驻东京大使的心腹密友。他同时指挥着一个由高级人士组成的间谍网。仅仅由于他的一则报告，即日本不会从东方进攻苏联，斯大林才得以向西线调走好些师团。这些师团幸而对取得抗击德国人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德国情报部门写的是关于那个西欧大名鼎鼎的“红色乐队”间谍网。该文绘声绘色地叙述了这个间谍网的头子利奥波德·特雷勃的生活情况。特雷勃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心性高傲，反对教皇权力的犹太人。他就在盖世太保的眼皮底下，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向莫斯科提供极为详尽的军事和军需情报。

除此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有价值的报道了。有一份关于第三国际柏林秘密总部的详细技术分析。该总部在被希特勒摧毁前，一直负责指挥整个欧洲的间谍和秘密活动。此外，还有一些在战争以前或战争期间参加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官员的审讯记录以及苏联各种保安和情报机构组织情况的分析报告。

每逢夜晚和周末，我要么是在方圆半英亩的花园里锄草来活动活动我那隐隐作痛的骺髌关节，要么就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部分列宁著作和一些斯大林的著作。后者读起来真的是味同嚼蜡。我很想从科学上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会使一个头脑聪明的年青人变成共产主义者。为此，我试图把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思想用简单的英语表达出来。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到“绝对保险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实现，我共计归纳出十九条。我开始给我们自己单位的受训者以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学习班讲授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情报学。我们大家都在开辟新的天地。

与此同时，总统的顾问们正致力于解决军事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器新的指挥机构之间的统一问题。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即杜诺万将军向战略情报局作告别讲话之后两年，国会通过法案，正式成立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的诞生是美国军事机构全面重建工作的一部分。根据一九四七年的《国家安全法案》成立了美国空军、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国会通过的，对美国的涉外事务能力影响最为深远而争论最为激烈的一项立法议案。争论的一小部分是关于国家情报机关的权利所属问题。有人想把中央情报局划归国务院；有人希望它从属于新成立的国防部；还有人期望这是一个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向总统报告的独立机构。持最后一种意见的人终于占了上风。

我们从此不用再受捉摸不定之苦了。现在我们是美国的官方情报机关，是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一个指挥机构，即：特别行动处。中央情报局本身的建立，首先是为了核实和评价华盛顿的情报。华盛顿的情报来源有：国防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海、陆、空三军情报局等。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总统和他们政策顾问们对国外的重大情况准备研究和分析报告。

《国家安全法案》获得通过之前，在新的情报局是否应搞秘密情报活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一方面是搜集秘密情报；另一方面是替总统对情报进行加工、评价。将这两方面的权力统归一个机构的想法曾遭到强烈反对。但这种反对的意见被否决了。中央情报局从而在西方各情报机构中间独树一帜了。在西方各国，秘密活动和整个情报工作，毫无例外一律都是分道扬镳的。

《国家安全法案》并未直接提到间谍和反间谍的活动。但《法案》中专门有一小段授权中央情报局“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

可能经常发出的指示，发挥其与影响到国家安全的情报有关的其他职能和职责。”这里指的就是秘密情报活动。我们的这个机构是在秘密之中诞生的。

中央情报局成立后不到一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加秘密地再次授权中央情报局，除了搜集情报外，还要执行隐蔽的行动计划。

从战略情报局解散到中央情报局成立，只是短暂的两年。在此期间，世界象大战期间一样，发生了剧烈而戏剧性的变化。好几十个国家都因内战、政变、武装占领、操纵选举、暴乱和兵变等原因而经历了政治上的变迁。这些国家发生的动乱，有的起因于上层文、武人士的争风斗角；有的则诱发于群众性反穷困的抗议活动；有的是因为宗教狂热；更有的是由于受了莫斯科的挑唆。

在这国际上风云激荡，国内歌舞升平的两年中，华盛顿——莫斯科轴心表面上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公众面前，白宫对俄国的态度是友好的，最起码也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战争时期对苏联人的那种同志般的友谊与忠诚之感犹存。直至一九四八年总统选举时，杜鲁门总统还在说：“老约瑟这个家伙还不那么坏。”

公众的松懈情绪并未影响到我驻莫斯科大使馆。一九四六年二月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给国务院拍来一封动过一番脑筋的八千字电报。这封电报论述了战后苏联的态度及其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他的分析概要翌年登于《外交事务》杂志上大名鼎鼎的×先生的文章里。凯南主张美国必须制定一项遏制政策来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他到民族战争学会作最后一次演讲，最清楚不过地阐述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认为，美国是“世界历史荒原上的一个孤单的，受威胁的国家。……世界的一部分已被一个处心积虑总想毁灭我们的政治大国所征服和利用。”

“共产主义威胁”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战争恐怖、间谍恐怖和红色恐怖。

战争恐怖起始于柏林封锁。它随着一九四九年九月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及此后不到一年之内对朝鲜的入侵而达到了极点。苏联对朝鲜的侵略使杜鲁门总统及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共产主义征服独立国家的手段已超越了颠覆阶段；现在是要发动武装侵略和战争了。”

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发觉苏联军事间谍活动已深入到美国的原子机密之中。一九四八年的公开审讯清楚地说明，无论是战前、战争期间，还是战争以后，苏联间谍一直都在华盛顿进行活动。联邦调查局雇员朱迪思·科普朗因间谍罪于一九四九年被捕。同年，阿尔杰·希斯因伪证罪而受审。最轰动一时的要算“红色间谍网”事件了。英、美籍苏联间谍将原子弹秘密交给了莫斯科。克劳斯·富克斯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原子科学家。他刚从美国回到英国就被逮捕了。一九五一年三月，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埃塞尔·罗森堡因向俄国人出卖原子机密而在激烈的公众舆论中于纽约开庭受审。由于一道简单的方程式而导致一场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的间谍歇斯底里。这个方程式便是：原子间谍对入侵朝鲜负有责任。倘若苏联人手上没有原子弹的话，是不至于如此大胆得罪美国的。

关于“赤色威胁”的问题，是在一九四八年夏天，被共和党的一个委员会公诸于众的。对赤色威胁的胁迫感随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于一九四九年十月的成功而愈益加深了。因为，之所以丢掉中国，是被归咎于国务院里的“赤色分子”。在随后的四年中进行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揭露和感情冲动的辩论。最后终于导至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赤色分子的迫害事件。

早几年的忠诚程度调查相对说来并未给中央情报局带来什么损害。好多曾经在战略情报局任职的共产党人都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他们全部都已脱离了公职或在战后对中央情报局全体人员进行的详细审查中被解雇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放弃了一些总部

和第一线人员。他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搞同性爱或酗酒，容易成为苏联讹诈的对象。有一些非共产党左派分子则是被要求退職的。

不过，在第一线单位，气氛仍旧是小心翼翼的。我还记得我同我的上司、一个陆军上校的两次谈话。

一九四八年秋，我利用业余时间写好了马列主义总结。我建议给各情报站送去一些《马克思的福音》这本书，以期对我们的办案人员，尤其是那些搞共产党问题的人有所启发。这位上校坚决不干。他说，如果哪一位国会议员弄到一本，他就会指控中央情报局向自己的成员灌输共产主义。我坚持说，要“了解敌人”就应这样，但说服不了他。最后上校还是同意将书发出，但有个条件，要按机密材料处理。虽然这本书引用的材料全部都是公开的，但送往各情报站的书都加了一层保护性封皮。封面上都打上了“机密”字样。

同年冬天，我打算雇用一名美国国籍的美国人。这是一个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的多才多艺的儿子。我要让他去建立并管理有关苏联的专门档案。上校把我叫去一道研究此人的自传。就我看来，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此时，上校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处的那些工作人员再也没有什么捉摸不定之感了。苏联是我们的敌人。苏联这个目标是我们情报活动的对象。我们在工作上，感情上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我感到，如同我们过去反希特勒一样，我们也是反斯大林远征军的一部分。我们一天努力奋战十几个小时，夜晚干，周末也干。气氛是十分紧张的。对情报人员来说，冷战实为热战，因为我谍报人员的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今天，我们可以相对说来比较冷静地去回忆当时的心情。但即使这样，也很难说清楚当我们刚刚开始这样工作时公众的情绪究竟怎么样。“歇斯底里”、“妄想狂症”等字眼时刻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如果前者主要是指“感情容易冲动”，后者主要指